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丛书

#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

“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

谢维扬 赵 争 主编

中西書局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丛书——

#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

“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

谢维扬 赵 争 主编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  
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 / 谢维扬, 赵争主编.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11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丛书)

ISBN 978-7-5475-0942-5

I. ①出… II. ①谢… ②赵… III. ①中国历史—古  
代史—史料学—文集 IV. ①K2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462号

---

---

#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

——“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

谢维扬 赵 争 主编

---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 (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75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942-5/K·190

定价 75.00元

---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项目编号 12&ZD133)  
的阶段性成果

# 序

谢维扬

自20世纪以来,对于新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至今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在内的一批又一批珍贵资料接连涌现,激发了学术界空前高涨的研究热情,而对于推动相关研究之意义尤为重大。新学问多源于新材料,新出土文献不仅直接促成了成熟的简帛学的形成,更将对古代文献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自2002年成立以来,在与学界同仁长相切磋中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国古史和古代文明进程等领域的研究。2012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上海博物馆、四川师范大学等院校及科研院所诸多同行合作,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立项。“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问题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文献学基础”为该项目的子课题之一,任务是探讨在新出土文献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于中国古代文献问题的新认识及其对古史研究所带来的影响,探讨当代中国古史研究所能依赖的合理的史料学概念。为更好地推动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作为该子课题研究活动的重要步骤之一,2013年10月26日至27日,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历史系与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举办了“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在对新出土文献及相关传世文献研究基础之上,聚焦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问题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文献学基础问题,对古书形成与流传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尤其是对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合理运用文献资料的正确方法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以期在探讨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基础方面有新的推进。本书即为此次会议所发表论文的汇集。

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及《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编辑部的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会议也收到了来自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刘钊先生的贺信。从诸位专家、学者为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情况来看,有关新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古史研究及古史史料学问题,已在相当的范围内引发了持续的关注,诸多研究者不仅对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及其所涉及的古史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而且不少研究者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对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中更为一般性的规律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总结,这其中不仅包括对古书文本本身的体例及演变规律的研究,更包括对与古书成书及流传形态密切相关的古书记述内容的特征及形态的研究。

本书所收论文所体现的上述情形,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学界在新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领域的新动态。学者们对所讨论的许多具体问题均有各自精辟的见解与合理意见,但在整体上也反映出了一些共识,其中关涉古书成书及古史史料学研究的原则性问题经我领会或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古书成书及相关古史史料学研究必须要重视出土文献资料的重要作用,要努力探究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科学的、合理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

二、汉魏以前古书的形成及流传过程往往较为复杂,以较为简单的单线性解释模型很难准确概括其间可能的复杂情形,也很难准确解释和概括古史史料及古史研究中的复杂问题;

三、在对具体资料做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古书成书及相关古史史料学研究已经到了需要形成更全面的研究布局,涵盖所有有关资料,包括出土的与传世的,从更加宏观的层面进行更具综合性的研究的阶段;

四、作为汉魏以前古书的形成及流传过程复杂情形的集中反映,目前普遍存在的诸书互见现象需要对之进行更为细致与深入的研究,其中“纵向比较的”研究——针对不同历史时段的古书成书模式及特点的研究,与“横向比较的”研究——对不同文本类型所对应的古书成书模式及特点的研究,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的研究方向;

五、古书成书研究可与古书体例研究结合进行。古书体例若可概括为古书在形成及流传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时期,在文字和其他表现形式上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组合,并且其通常会反映特定时期里古书成书和流传的某些具体做法和过程特点的话,则古书体例无疑是古书成书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一点应引起研究者高度注意。

很显然,以上这些在此次会议中反映出来的关于古书成书及古史史料学问题的共同认识,鲜明地反映出不断涌现的新出土文献不仅重新激活了我们对相关传世文献的认识,更刷新了我们对古书形成及流传状态的知识 and 视野。它们无疑是新资料不断涌现与学界对古书成书及古史史料学问题长期探索两个方面相合而成的结果。但要推进整个研究,对每位研究者都应该说还任重而道远。从有关古书成书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以往针对古书“真伪”问题的较为简陋、单一的品质判定式的研究方法,正逐渐向基于长时段、动态研究的关于古书成书问题的“古书年代学”及“古书形态学”并重的研究布局转变,这应该反映了对古书成书及古史史料学研究思路 and 视角的提升和转换。与此相应的,古史史料学研究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早期文献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古书内容元素来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已经在理论研究的高度上得到关注和重视,并取得可喜的研究进展,这些也都是古书成书及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对新材料及相关传世文献研究的持续推进,我们对古书成书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因而更为准确、完整,这将使我们更加逼近建立更为科学的古史史料学理论的目标。

我希望这本论文集将对学术界同仁了解上述的情况有所帮助,也对推进出土文献和古史史料学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此次会议组织及论文集出版等工作均由宁镇疆教授负责实施,本书具体编辑工作由赵争博士负责。本书出版得到中西书局的大力支持,李碧妍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工作倾注了巨大精力,在此谨深表诚挚的谢意。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 目 录

|                                              |           |
|----------------------------------------------|-----------|
| 序·····                                       | 谢维扬 / 1   |
| 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 ·····                         | 杜 勇 / 1   |
| 谈汲冢“《周书》”与《逸周书》<br>——从出土文献研究看古书形成和流传问题·····  | 王连龙 / 24  |
| 《礼记·丧服四制》篇形成研究<br>——兼说古书之间“互见”的类型学问题 ·····   | 宁镇疆 / 38  |
| 《大学》成书问题新探<br>——兼谈朱熹怀疑《曾子》十篇真实性的内在思想根源 ····· | 刘光胜 / 67  |
| 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br>——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 ·····  | 马世年 / 85  |
| 帛书《系辞》成书问题补议 ·····                           | 赵 争 / 100 |
| 从出土文献谈古书形成过程中的“族本” ·····                     | 李 锐 / 107 |
| 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                     | 谢维扬 / 121 |
| 由清华简看《书》<br>——兼说关于古史资料的可信性问题·····            | 黄怀信 / 141 |
| 清华简《系年》体例及相关问题发微 ·····                       | 罗运环 / 147 |
| 清华简《筮法》与周代占筮系统 ·····                         | 程 浩 / 161 |
| “邦风”问题再探：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风》诗的早期<br>形态·····       | 王 刚 / 170 |



由上博简《平王与王子木》与《说苑》的比较谈古书流传

过程中的文本问题·····谢科峰 / 201

战国楚简数字卦与筮法·····赖少伟 / 214

简帛《老子》编述与传布问题宏观

——兼谈对于出土文献文本研究的几点认识·····赵 培 / 233

从竹简《文子》看今本的伪造手法 ·····张固也 / 263

“太一”臆解

——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彭 华 / 278

《礼记》、《论语》文本对读刍议

——以《乐记》篇为例 ·····吴国武 / 296

《苍颉篇》的版本、流传、亡佚和再发现 ·····伏俊琰 张存良 / 311

从“互见”关系看《韩诗外传》的文本特征·····樊 东 / 330

从盐业考古新发现看《管子·轻重》篇 ·····燕生东 / 341

从语言角度看汉晋孔氏家学群书·····宗静航 / 364

# 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

杜 勇

《耆夜》是清华简中公布较早的一篇出土文献。篇中武王伐黎及饮至诗歌等内容前所未见,与传世文献形成巨大反差,一时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人们对武王伐黎、饮至礼仪、周公作诗诸事各有不同的诠释,但大多不怀疑《耆夜》记事的真实性。至于个别学者从礼制、用语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耆夜》是“现代人的拟古之作”<sup>①</sup>,则似过偏激。不过,出土文献也存在一个制作年代问题,这是不容疏忽的。大凡文献的制作年代不同,其史料价值就有高低之分。本文拟就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和记事内容再作探索,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书的形成过程和文献价值,以就教于方家。

## 一、《耆夜》特别的纪年方式

清华简《耆夜》开篇即称:“武王八年,征伐郛(耆),大戡之。”<sup>②</sup>这种纪年方式与其著作年代颇相关联,然鲜为学者所察。关于《耆夜》的著作年代,有的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sup>③</sup>,也有人认为时代可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与古史寻证”(12BZS01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姜广辉等:《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

②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中西书局,2010年,第150页。释文尽量用通行字,以便排印。下引古文字同此。

③ 刘光胜:《清华简〈耆夜〉考论》,《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

能更晚,《耆夜》中的诗作都应该是“战国时人的作品”<sup>①</sup>,或者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sup>②</sup>。这些意见都值得重视,至少比把《耆夜》默认为商末周初文献要合乎事实一些。这里,我们想从《耆夜》纪年方式的角度对其著作年代略作分析。

以事系年是中国古典文献的优良传统,这在殷商末年的甲骨金文中即初露端倪。例如:

辛酉,王田鸡麓,获大鬻虎。在十月,唯王三祀,协日。(《合集》<sup>③</sup> 37848)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惟王八祀。(《合集》37849)

己丑,王在桮,郊其易贝。在四月,唯王四祀,羽日。(《集成》<sup>④</sup> 05413,四祀郊其卣)

癸子(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彤日,在四月,亚矣。(《集成》09249,小臣邑斿)

上引商末甲骨金文,其纪时方式大多为日、月、祀(年)相次,且王年置于文末,个别情况是月序在王年之后。周初金文略有变化,主要增加月相词语以精确纪日,其历日要素通常是以月序、月相(或缺)、历日、王年相次,王年仍然分置篇末。例如:

何尊(成世):“唯王初迁于成周,复禹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唯王五祀。”(《集成》06014)

小孟鼎(康世):“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集成》02839)

除此之外,文献中也可见到以历日、月序、王年相次的例子。如《尚书·洛

① 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② 刘成群:《清华简〈郜夜〉与尊隆文、武、周公》,《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

③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简称《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简称《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诰》云：“戊辰，王在新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及至穆共以后，以王年、月序、月相、纪日干支等历日要素融为一体，顺次排序置于篇首，则为金文中一种完备而正式的纪时方式。例如：

虎簋盖（穆世）：“唯王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近出》<sup>①</sup> 491）

裘卫盃（共世）：“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禹旗于丰。”（《集成》09456）

智鼎（懿世）：“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集成》02838）

达盨盖（孝王）：“唯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在周。”（《近出》506）

克钟（夷世）：“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厉）官。”（《集成》00204）

融攸从鼎（厉世）：“唯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官弭太室。”（《集成》02818）

吴虎鼎（宣世）：“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官弭官。”（《近出》364）

柞钟（幽世）：“唯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大师右柞。”（《集成》00133）

当然，像上面这种具有年、月、月相、纪日干支四要素的西周金文并不多，但它体现了当时文献对列王纪年的规范表达，即“唯王某年”或“唯某年”，从无《耆夜》“武王八年”即“某王某年”这种特别的纪时方式。尤其是“武王”的“武”为死后谥字，生前是万万不能用来纪年的。虽然西周有过几例王者生称谥的金文，但器铭都是该王死后所作，是作器者追述前朝旧事时使用了某王死后才有的谥号，<sup>②</sup>且无一例用于纪年。可见清华简《耆夜》

①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简称《近出》），中华书局，2002年。

② 杜勇：《金文“生称谥”新解》，《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武王八年”这种纪年方式不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

从现存文献看,较早使用王号纪年的著作是《国语》和古本《竹书纪年》。

《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又《郑语》:“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均为使用西周王号纪年之例。至于使用东迁诸王王号纪年者,更为习见,如《周语》上篇所谓“惠王三年”、“襄王三年”、“襄王十六年”;中篇“襄王十三年”、“定王八年”、“简王十一年”、“简王八年”;下篇“简王十一年”、“灵王二十二年”、“景王二十一年”、“敬王十年”,均是。《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言体国别史,记事始于西周穆王之征,下迄鲁悼智伯之诛(前453年)。其撰作和编定的年代,无论如何不能早于战国时代。

古本《竹书纪年》使用西周列王王号纪年,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略举数例如下: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琇玉。

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盘),为太子。<sup>①</sup>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原简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出于汲郡魏襄王墓,后来渐至散佚,今日仅有辑本。至于明代出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古本旧貌,不可轻信。由于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5年,则墓中古本《竹书纪年》当写定于前299年—前295年之间。

除《国语》、《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外,近出清华简《系年》也出现以王号纪年的情况。其第一章说:“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

<sup>①</sup>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62页。

千亩。”又第四章说：“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崩，起师伐卫。”<sup>①</sup>《系年》记事终于楚悼王时（前401年—前381年），其成书必在其后，也是战国中期的事情。

既然用王号纪年的著作均成书于战国时代，则《耆夜》当不例外，也应是同一时代风气的产物。只是这样推断可能会遇到一个反证，那就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说“印段赋《蟋蟀》”，而《蟋蟀》又见于《耆夜》，这是否意味着《耆夜》早在孔子出生前后即已流传于世呢？

应该说，印段所赋《蟋蟀》与《耆夜》中的《蟋蟀》并无太大差异。细绎简诗《蟋蟀》，可以发现它与《诗·唐风·蟋蟀》虽然字句略有不同，但“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主旨未变，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作品（说详后）。这与《诗经》中《扬之水》、《羔裘》等三篇同名而各为一诗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假定《耆夜》为商末周初作品，流传到春秋时代，则不可能不为孔子所知。因为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自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若周公真有《蟋蟀》这样的诗作，孔子必有阐发，恐非用“《蟋蟀》知难”<sup>②</sup>即可一笔带过。事实证明，这样推论是可以成立的。譬如今本《尚书·金縢》谓《诗·鸛鸣》为周公所作，然孔子同样未曾道及，今出清华简《金縢》证明周公实际只“遗诗”而非“为诗”，证实了前人怀疑周公作诗的正确性。<sup>③</sup>准此，可以确定《耆夜》必是孔子身后即战国时代撰作的文献。

那么，像这种追述前代历史的晚出之作，其史料价值应如何看待呢？就《国语》、古本《竹书纪年》来说，有些历史情节可能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总体上人们并不怀疑其可靠性。《耆夜》的体例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追述历史，而是有意再现一种历史的即时场景。这就要求它所反映的主要历史事实必须真实可靠，即使在细节上也不能例外。但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耆夜》的史料价值恐怕与《国语》、古本《竹书纪年》是不能等视齐观的。

①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中西书局，2011年，第136、144页。

②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③ 杜勇：《从清华简〈金縢〉看周公与〈鸛鸣〉的关系》，《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3期。

以历史细节论,《耆夜》开篇以王号纪年即与其所叙时代风格不符,而人物称谓亦有悖于史。在伐黎凯旋的饮至典礼上,周初所有的重要人物都上场了,然其称谓颇与他书相异。如周公与叔旦连称,召公与保奭连称,即为先秦文献所未见。特别是称“召公保奭”,实为不通之辞。保奭之名,一见于《君奭》周公之语,二见于《顾命》称“太保奭”,金文则只称“太保”或“公太保”,都是记录武王辞世以后的事情。《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尚书·君奭》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是知召公为太保是在成王继位之后。由于成王年少即位,天下动荡不宁,因而由“太保和太师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并成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sup>①</sup>。武王在位,年值英壮,召公不可能职任太保,亦不可称之为保奭。在饮至礼仪方面,毕公高为客,作册逸为东堂之客,此于礼则不顺。<sup>②</sup>举行饮至礼的“文太室”,整理者解释为“祭祀文王的太室”<sup>③</sup>,亦有可疑。“太室”为西周金文所习见,是处理朝廷军政大事的政事之堂,却从不见“文太室”一词。《尚书·洛诰》:“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只说成王在太室行裸鬯之礼,却不言文王、武王之类的太室。若当时果有“文太室”,则武王克殷归来应在这里举行献俘礼才对。但《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逸周书·世俘》记载此次献俘礼内容甚详,也只说武王“格于庙”、“燎于周庙”或“告于周庙”,“文太室”同样杳无踪迹。这说明在文王死后不久,未必建有专门祭祀文王的太室。

以主要史实论,武王不曾戡黎,周公未作《蟋蟀》,表明《耆夜》记事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只是这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下文将渐次展开讨论。

## 二、是文王戡黎还是武王伐黎

武王伐郃,是清华简《耆夜》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整理者以为

① 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② 丁进:《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③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第151页。

“郕,古书作‘黎’或‘耆’等”<sup>①</sup>,是很正确的。正如杨树达所说:“黎与耆为一事,旨与耆为一音。”<sup>②</sup>《尚书·西伯戡黎》称“西伯既戡黎”,《史记·殷本纪》作“西伯伐饥国”,《周本纪》则说文王“败耆国”,所言同为—事。汉唐学者对文王戡黎从无异辞,只是到了宋代胡宏《皇王大纪》以后,不少人以祖伊所言“殷之即丧”(《尚书·西伯戡黎》)那样的急迫形势,推测戡黎者应为武王。清人徐文靖、雷学淇、梁玉绳等人,笃信明代始出的《今本竹书纪年》,分“耆”与“黎”为二国,认为文王伐耆与武王伐黎“灼然两事”<sup>③</sup>。晚近甲骨文发现后,杨树达认为甲骨文之“旨方”“即耆,亦即黎矣”<sup>④</sup>。陈梦家却认为,“旨是耆国”,“召(黎)方”(今多释为“召方”)为“西伯所戡的黎”,认同“伐耆乃文王事,戡黎乃武王事”<sup>⑤</sup>,再次回到清人的误区。真是聚讼千年,一无了期。

近出清华简《耆夜》明言“武王八年,征伐郕(耆)”,是否可以解决这桩公案呢?看来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试图对武王伐黎给予合理的解释。一种意见可称为武王戡黎说,根本否定传统说法,认为戡黎的西伯不是文王而是武王。<sup>⑥</sup>另一种意见可称为文武分别戡黎说,认为文王、武王均曾戡黎,只不过文王所伐之黎在“新丰”,武王所戡之黎在“上党东北”,<sup>⑦</sup>或谓文王戡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武王所戡之黎为朝歌附近的“黎阳”,<sup>⑧</sup>意见亦极纷纭。

关于文武分别戡黎说,主要以《今本竹书纪年》来印证清华简,或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地名“黎阳”作为武王所戡之黎。《今本竹书纪年》可信度差,不足为证。而武王八年所戡之黎若在黎阳,地近殷都,武王何由勒马不前,

①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第151页。

② 杨树达:《居微居甲文说 耐林顾甲文说 卜辞琐记 卜辞求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③ 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第66页。

④ 杨树达:《居微居甲文说 耐林顾甲文说 卜辞琐记 卜辞求义》,第69页。

⑤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296、287页。

⑥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第151页。

⑦ 刘成群:《清华简〈乐诗〉与“西伯戡黎”再探讨》,《史林》2009年第4期。

⑧ 王鹏程:《“清华简”武王所戡之“黎”应为“黎阳”》,《史林》2009年第4期。



乃至次年又观兵盟津,亦无可说。至于杨筠如谓“新丰”骠戎为西伯文王所戡之黎,<sup>①</sup>亦与“楷(黎)侯”诸器出土于山西黎城相抵触。文武分别戡黎说的用意在于既不否定传世文献,又对清华简《耆夜》作出调和,以求圆满解决问题。但终因证据不足,无法达成善意的愿望。

相比之下,武王戡黎说所提供的证据则要复杂得多。依清华简《耆夜》文义,毕公似为此次伐黎的主将,进而推论有其子分封到他征服过的黎国,是为金文所见“楷(黎)伯”,<sup>②</sup>更显得《耆夜》关于武王伐黎记载的确凿可信。这便形成一条重要的证据链,立论基础比其他说法要牢固得多。但是,金文中的“楷伯”作为周代黎国的始封者是否为毕公之子,仍有讨论的必要。

论者以周代黎侯的始封者为“楷(黎)伯”,依据来自献簋。其铭云:

惟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邁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伯命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集成》04205)

郭沫若认为该器作于康王末年,楷伯“盖毕公子,献其臣属也”<sup>③</sup>。陈梦家将其列入成王时毕公诸器,认为楷伯恐是毕公之子“毕仲”。<sup>④</sup>唐兰断此为昭世器,谓“我的君长天子让桷伯赏赐他的臣子献一辆铜饰的车子”<sup>⑤</sup>。三家的共同点在于都把铭文中的“献”作为人名,“献”也就成了本器的器主。近读《张政烺先生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张氏认为铭文中“两献字皆动词”<sup>⑥</sup>,如是则器主当为“楷伯”而非“献”。反复研读铭文,觉得以“献”为器主确有不妥之处。一是铭文中主轴人物应为“邁王”的楷伯,何以不是他受到赏赐,而是他的臣子?二是“献”受到赏赐,何以对其功绩只

① 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184页。

② 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

③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六),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6页。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53页。

⑤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5页。

⑥ 张政烺:《张政烺先生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华书局,2011年,第114页。